

论闻一多的文化思想

孙 党 伯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孙党伯 (1934-), 男, 湖北黄冈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关键词 闻一多 中西文化 道德层面

内容提要 闻一多是在中国 20 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汇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他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抉择, 正反映了他的文化思想及其特点。闻一多的文化思想是开放的, 而不是封闭的; 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 他既不拒斥, 也不盲从, 而是认真吸取, 使其中国化、现代化;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他与五四时期的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有所不同, 他不是彻底否定, 而是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 后期认识有了发展与转变; 在文化的伦理道德层面上, 闻一多理智上趋新, 行为上守旧, 表现出矛盾的状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 (1999) 03-0009-05

今年 11 月 24 日是中国现代杰出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闻一多诞生 100 周年纪念日。百余年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急剧变革。在闻一多诞生的半个世纪前, 中国封建帝国的大门就被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 各种西方文化思潮也随之流入, 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出生以后, 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和交锋更加剧烈。闻一多正是生活在中国 20 世纪中西文化思想大碰撞、大交汇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思潮, 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他必须像同辈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作出自己的抉择。闻一多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他的抉择既有与同辈先进知识分子的一致性, 又富有独特性。我们从他对中西文化思想的抉择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文化思想及其特点。

—

闻一多的文化思想是开放的, 而不是封闭的。闻一多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 从小就接受传统的经史教育, 并受到它的熏陶, 但他同时也较早的接受“新学”的教育, 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 闻一多的态度是开放的。在清华求学期间, 闻一多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从他当时写下的《仪老日记》和文章看, 他所阅读的外国文学历史书籍是相当丰富的, 如《天演论》《希腊史》《罗马史》和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康德、费希脱、罗素等人的著作就读过不少, 这对开阔眼界是大为有益的。当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发生时, 闻一多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其中, 成为清华学生的代表。对五四文学革命表示由衷的肯定, 他积极创作新诗, 撰写白话文, 并提出: “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 且处此二十世纪, 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意味; 故今之参借西法以改革诗体者, 吾不得不许为卓见。”^①

在闻一多看来, 任何文化和文学艺术只有大胆吸取外来的异质文化及新的文学形式, 才能得到发展。在 1920 年发表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一文中, 他明确地指出: “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 应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底印象扫去, 换上一个新的, 理想的艺术底想象, 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 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

乃是熔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很明显,闻一多对西方艺术抱定欢迎学习的态度。在稍后发表的论文《〈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更提出他所理想的新诗既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到美国留学,选择西洋美术为自己的专业,是很能说明他对西方艺术的态度。

到了后期,随着阅历、学识的丰富,闻一多的开放意识更加明确坚实,更具理性色彩。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他从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从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刻的观点:任何文化都必须不断地从异质文化中吸取养份,才能发展壮大,否则就会逐渐消亡。他说,世界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的文化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②这种观点与《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观点非常相似。《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闻一多可能是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启发而提出上述看法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闻一多从四个古代文化的不同结局,提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观点。他说,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即印度、以色列、希腊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别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惟有中国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免于没落的劫运,其原因是由于“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可见“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④闻一多还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路线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说,诗是中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但诗发展到了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自南宋起就转向了小说戏剧的时代,而中国的小说戏剧是在充满故事兴味的佛经的翻译与

宣讲的影响下产生的,后来又受到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小说戏剧文学的影响。正因为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历来能够不怯于“受”,能够吸取,所以才不像其他三个古老文化那样遭没落,而保留了自己文化的主人地位。可见,要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

二

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闻一多既不拒斥,也不盲从,而是认真吸取,使其中国化、现代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少年闻一多就决然剪去象征着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辫子,表示对这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革命的拥护。考入清华学校后,还编演新剧《革命军》,赞扬这场制度文化的大革命。他在最早发表的新诗《西岸》里更表现出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向往倾慕之情。

在留学美国期间,闻一多虽然由于遭受某些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在不少诗篇中崇仰、赞颂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并不否认美国工业的发达与艺术的进步,更没有放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将西方异质文化中国化、现代化的努力。在致友人的信中,闻一多说:“我们从前攻击的诲淫诲盗的长片,在这里见不着。”“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在美国机械与艺术能够同时获得高度发达,而中国“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那里去了呢?这里便是东西文明的分别了。西方的生活是以他的制造算的;东方的生活是以生活自身算的。西方人以accomplishment(成就)为人生之成功,东方人以和平安舒之生活为人生之成功。”^⑤如何发现和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用以改变中国的现状,是闻一多关注的重心。他曾经信奉“艺术救国”,但很快发现它的无效。随着他留美后学识的增长,眼界大开,在启蒙与救亡的问题上,他似乎更看重救亡。在1924年致家人的信中说:“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文化,为功至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⑥这说明闻一多对西方文化的吸取重心有了大的转变,即由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学习到重点关注西方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并从事使这种异质制度文化中国化、现代化的尝试。

可是,闻一多对西方制度文化的第一次选择就

出了偏差。虽然闻一多曾赞颂孙中山为“南海之神”，但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等正确主张却未为他所接受。相反，却参加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回国后又参加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与醒狮等国家主义派为伍，同中国共产党对抗。尽管闻一多当时深怀爱国感情，期望国家富强，但他的这种选择无疑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他那时对大量涌入的多种西方文化思潮缺乏鉴别能力，特别是不了解资本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的实质，加之又轻信了报章上攻击苏俄和共产主义的错误宣传，因而作出了错误选择。

闻一多虽然首次选择失误，但他从未放弃吸取西方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追求。就在他向内走进书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时，都始终注意吸取现代西方社会学说，如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众多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创造性的重大成就，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闻一多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现实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后，他的文化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⑦。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上，闻一多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幻想中国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老路，照搬西欧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制度，而是主张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样，闻一多的文化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若不是反动派过早地杀害了他的生命，他将会以科学的唯物论为指导，批判地断承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起一种新的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三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闻一多的态度与多数“五四”文化革命的战将有所不同，他不是彻底批判与否定，而是主张从中吸取养份。到了后期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发展和转变，有了新的价值判断。

“五四”时期，为了打破数千年封建礼教的统治，先进分子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北京《京报副刊》向他征求青年必读书书目时，他交了白卷，一篇未列，且说：“我以为要少——

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⑧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却不同，他不仅自己坚持阅读古代典籍，而且一再叮嘱弟妹们“经、史务必多读”^⑨。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闻一多认为“《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底文化。”又说：“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⑩如果拿今天的眼光来看，闻一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较为稳妥，而鲁迅等则似嫌过于偏激；但在当时那种封建思想统治异常严重、新文学刚刚诞生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鲁迅等的态度更具革命性，所谓矫枉过正便是这个道理。

闻一多前期对传统文化的敬爱既是因他自幼受其熏陶，也是由于在美国留学受人歧视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的表现。他刚到美国不久就给父母写信说：“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⑪闻一多当时并不是没有看到中国在工业生产和艺术生产上的落后，他之所以拿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来傲视那些轻视中国的美国人，则是对种族歧视的谴责，是自慰，更是自励。为此他写了许多赞颂中国古老文化的诗篇，如《长城下之哀歌》等，并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⑫闻一多说“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实际上他当时爱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理智的作用，不如说是感情的作用，是一种不甘被人歧视的逆反心理的反映。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特别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后，闻一多终于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与实质，他早年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赞颂之情也一扫而光。在后期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中，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闻一多指出：中国三千年来的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

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⑧他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儒家思想及道家、墨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是拥护奴隶社会的,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孔子的后学董仲舒将儒家思想“略加修正”,便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帖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直到孙中山先生才醒转一次。”儒家是当时社会机构中的一种缓冲阶层,站在主奴之间,主奴矛盾是他生存的前提,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上打算盘。”^⑨墨家本想“实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见实现不了,便转而“破坏秩序”,墨家也随之“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道家“因根本否定秩序而逃掉”,有的儒家做官捞肥了,跑到别墅或山庄,便一变而为居士,也就是道家了。所以闻一多称儒家为偷儿,道家为骗子,墨家为土匪,并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⑩十分清楚,闻一多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剖析、批判是极为深刻有力的,可以说完全击中了传统文化的要害。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开鼓吹封建道德文化,想把中国文化拖回到封建文化的轨道上去,以维护其反动统治。这本书所鼓吹的陈腐思想使闻一多吓了一跳,他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⑪可见,闻一多当时提出要发扬“五四”精神,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其矛头也是指向鼓吹封建文化的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的。

应该指出,闻一多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说都是绝对正确的,但他的批判精神是我们重视和肯定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中国传统文化虽不能彻底否定,但任何想提倡儒家学说来救国、兴国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四

在文化的伦理道德层面上,闻一多理智上趋新,行为上守旧,表现出矛盾的状态。我们知道,在文化结构中是分为许多不同层面的,其中有些层面,如物态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等,都有活跃的变异性;而心态文化层面,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礼俗、民俗、风俗、伦理道德等则具有较浓厚的保守性。在“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理智上趋新、情感上守旧的

人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五四文学革命的旗手鲁迅在反对封建文化、礼教的斗争中态度是极为坚决的,可他却是有名的孝子,从不违抗母亲的意愿。他对妻子朱氏虽然毫无爱情可言,却依照母亲的意愿与朱氏订婚、结婚了,而且为了母亲,他一直与朱氏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闻一多的情形也有些近似。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道理应该是清楚的,也是向往的。但是,当父母为他订婚时,他心里虽不满意,行动上还是服从了。后来父母让他结婚,他心里也不愿意,行动上又服从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不能违抗父母之命,对父母不孝,不讲孝道这是为旧的伦理道德所不容的。闻一多在婚后给父母的信中说:“我之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⑫这里表面上说自己甘愿为父母作出牺牲,其实内心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的。他在稍后给弟弟的信中说:“家庭是怎样地妨碍个人底发展啊!”“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指发!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经(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⑬请看,闻一多是忍受着多么巨大而强烈的内心痛苦来顺从父母的意愿啊!与其说是家庭的铁链捆住了他的手脚,不如说是以孝为核心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束缚了他的思想。尽管后来他同夫人高贞的感情甚好,但他最初在婚姻问题上一味顺从父母的意愿,恰恰说明他当时在伦理道德这一深层的文化心态是守旧的。

不仅如此,闻一多事后对这一包办婚姻甚至抱着沾沾自喜的态度。《红豆》第36首这样写道:

当我告诉你们:

我曾在玉箫牙板,
一派悠扬的细乐里,
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
我曾著着银烛,
一壁撷着伊的风钗,
一壁在伊耳边问道:

“认得我吗?”

朋友们啊!

当你们听我讲这些故事时,
我又在你们的笑容里,

认出了你们私心的艳羡。

对这场父母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婚礼，诗人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相反倒有点洋洋自得、似显骄人的得意之色。

闻一多在《红豆》这 42 首诗中抒发了相思之情，但这与其说是远在异乡对妻子的思念，不如说是对理想的爱情的执著追求。闻一多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他照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在留美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段婚外恋情。1925 年春，他从纽约给梁实秋寄去一信，说：“前数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诗，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据梁实秋回忆说：“一多的这首英文诗，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了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⑥当时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正在排演古装戏《杨贵妃》，闻一多包揽布景、服装设计制作等，十分忙碌，可能就在这次演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邂逅。但具体与谁发生邂逅，则无从查考。这首英文诗后经美籍华人许芥显译成中文，载于 1981 年 4 月号《诗刊》上，诗题为《相遇已成过去》，现抄录如下：

欢悦的双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企求叫你深情的微唱。

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
你的风姿更丰盈，而我则依然憔悴。
我的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
“我们的缘很短，但也有过一回。”

我们一度相逢，来自西东，
我全身的血液，精神，如潮汹涌，
“但只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

留下我的心永在长夜里怔忡。

这是一首情感真挚的抒情诗，比起《红豆》42 首来更加感人。它充分说明，闻一多在爱情问题上，是用高度的理智来控制，扼杀自己的感情，使之不逾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界限，足见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1931 年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写了一首长诗《奇迹》。对这首诗的内涵，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据当时与他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回忆说：徐志摩创办《诗刊》不断向闻一多逼稿，以为《奇迹》是他挤逼出来的。其实是徐志摩误会了，“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⑦如果梁实秋的回忆可信，那就再一次证明，当理智与感情产生矛盾时，闻一多总是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即使有一点越轨，也要马上打住，使自己的行为不逾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界限。

注 释：

- ①②④ 《闻一多全集》第 10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6 16 21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55 页。
- ⑤⑥⑦⑨ ⑪⑫⑬⑭ 《闻一多全集》第 12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2 203 380 13 50 215 25 34 页。
- ⑧ 《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 页。
- ⑩⑬⑭⑮⑯ 《闻一多全集》第 2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8—121 356 397—399 381 431 页。
- ⑰⑱ 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散文》第 1 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5—396 419 页。

（责任编辑 吕 慎）